

西方主流宏观调控政策 在中国的实践与反思

刘明远

(中国人民大学 经济学院 北京 100872)

摘要: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以来的宏观调控,对促进 GDP 高速增长与物价基本稳定发挥了重要的影响作用,但它未能有效防范社会生产重大比例关系失调,最终酿成了全面产能过剩、过度负债、库存积压严重,究其原因主要在于片面强调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主导作用,忽视了社会再生产是价值形态运动与实物形态运动的统一,是价值补偿与实物更新的统一,以及与此相适应的宏观管理模式应当是价值形态调控与实物形态调控相结合,供给侧管理与需求侧管理相配的协调系统。因此,以马克思宏观经济运行理论为指导,改进宏观调控方法是中国当前及今后改善宏观经济运行质量的当务之急。

关键词: 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 宏观调控; 产能过剩;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中图分类号: F1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 - 2674(2017) 06 - 029 - 09

一、问题的提出

自从中国实行经济体制改革以来,经济曾一度保持了多年“高速增长”、“低通胀”态势,政界与学界中的许多人将这一结果归功于改革开放和宏观调控,这意味着宏观调控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的宏观调控模式是在借鉴西方主流市场经济国家调控模式及其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建立起来的,起先夹杂着许多计划经济的因素,行政手段与实物量指标占据主导地位,后来这些因素逐渐减少,取而代之的是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以及 GDP、CPI、PPI、储蓄、投资、消费、财政收支、国际收支、人民币汇率、货币供给量、利率等一系列价值量指标,并且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宏观调控模式。在越来越偏好于使用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调控经济的那些年,中国做到了 GDP 多年的高速增长与平稳增长,也使 CPI、PPI 保持了多年的低水平,但却没有意识到在这“高速增长”与“低通胀”背后却酿成了严重的比例失调,酿成了全面的产能过剩、过度负债、资产泡沫。随着 2008 年世界经济危机的爆发,中国经济也随之断崖式下行,政府猛烈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虽然阻止并迅速逆转了 GDP 的走势,推动经济增长率短期内回到两位数以上,但造成了更加严重的比例失调,在随后漫长的 GDP 下行中,产能过剩、过度负债、资产泡沫集中释放,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再也无法有效阻止 GDP 下行的趋势。面对严峻的经济形势,政府不得不偏重于行政与计划手段,从实物量结构均衡的角度强制推行“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三去一降一补”)为主攻方向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此同时,需求侧调控转变方式,由大水漫灌式调控转向区间调控、精准调控、定向调控、相机调控,经过一年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需求侧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调控的密切配合,“三去一降一补”取得明显成效,一些产能严重过剩行业的产品价格明显止跌回升,企业利润进入正常区间,一些行业出现复苏迹象。国民经济宏观管理模式的这种变化是在习近平总书记供给侧

收稿日期: 2017 - 03 - 22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2BJL003)

作者简介: 刘明远(1961 -),男,内蒙古鄂尔多斯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

管理与需求侧管理相互协调理论的指导下实现的,而习总书记的这个理论是对马克思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的创造性发展与应用。

本文着眼于中国实行经济体制改革以来的经济周期、经济波动、产能过剩、过度负债、宏观调控模式的演变,以及在习近平总书记新常态理论、供给侧管理与需求侧管理相互配合、协调推进理论的指导下正在推进的需求侧结构性改革,以逆向追溯的方式说明马克思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对中国驾驭经济周期、促进宏观调控模式创新的重要意义,以及发展和完善马克思主义宏观管理理论的迫切性。

二、投资冲动、经济波动与宏观调控政策的选择

多年来,学界、政界许多人往往把“投资冲动”看作“经济波动”的根本原因,这种认识对宏观管理方式的选择会产生不利影响,很容易用片面的、治标的办法来应对经济波动。

计划经济时期,计划部门按照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制定计划;落实部门按照计划分钱、分物、下达生产任务;执行机构组织完成生产、供给与流通任务。从理论上说,这样的一种国民经济管理模式应该能够使经济平稳运行,但事实上那个时代的经济却一直处于剧烈的波动状态,学术界在多年来的阐释中将其归因于政府的周期性“投资冲动”,即为了克服严重的供给不足,政府不顾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的严重短缺,地方政府基建项目一哄而上,结果因为投资规模过大、资源短缺、物价飞涨而难以为继,最后不得不收缩规模,停建或缓建一批项目,造成经济的剧烈波动。他们认为,这是短缺经济时期特有的经济规律,只要经济仍然处于短缺状态,不管国家如何注重宏观经济管理,都无法避免“投资冲动”与产品短缺之间的矛盾,因而也就无法避免投资的周期性大幅度伸缩与经济的剧烈波动。这种观点等于承认短缺经济是经济波动的主要制约因素。所谓“短缺经济”实际上就是“总供给小于总需求”、“有支付能力的消费大于生产”或“供给不足”,属于另一种类型的社会经济总量关系失衡、比例关系失调,把计划经济时期的经济波动与短缺经济相联系,把短缺经济与比例失调相联系,显然是正确的思路,符合实际,只是逻辑推导还应该进一步展开。因为在短缺经济的背后还有更深层次的制约因素,这就是微观经济缺乏活力。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表明,随着国有企业“抓大放小”,民营经济迅速崛起,经济活力开始释放,很快就告别了短缺时代,迎来了全面产能过剩时代。所以,只要能不断完善经济体制制度,赋予微观经济以活力,经济短缺对投资的制约就会解除。

事实上,只要政府是一个投资者,同时又是实现宏观经济目标的执行者,“投资冲动”就难以避免。无论短缺经济时期,还是生产全面过剩时期,均如此。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国际收支平衡、社会总供给等于社会总需求等宏观经济目标的实现,客观上要求政府担负起投资者与宏观调控者的职能,需要政府采取经济、行政、法律、计划等手段,弥补市场失灵,协调全社会的重大投资比例关系,推动经济发展和结构优化,以实现经济的顺利运行。只要履行这些职能,政府就必须追求GDP的最大限度增长,因为只有这样,财政收入才能增加、就业才能缓解,官员才能升迁。所以,履行政府职能的官员必然会充分利用各种可以利用的资金来源与投资机会,以推动GDP的最大化增长。而且,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远比中央政府强烈。^①所以,市场经济时期,政府的投资冲动不会因为体制制度的转型而消失,有时可能会更加强烈。但是,这个时期,制约投资冲动的主要因素发生了变化,即由短缺经济转变为过剩经济,过度投资不再因为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的供给不足被迫收缩,而是因为生产过剩不得不收缩,但生产过剩意味着总供给与总需求、生产与消费等重大比例关系的失调,其背后更深层次原因在于不合理的分配制度。所以,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之后,“投资冲动”仍然是经济波动的一个直接因素,抑制经济过度波动不仅要防止“投资冲动”造成的重大比例关系失调,更

重要的是还须解决深层次的分配问题。

从表面看,每一次大规模集中投资之后,就是经济的剧烈波动,只要投资的节奏与规模平稳,经济增长也就能稳定,似乎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就是一个投资的周期性波动问题。根据这种现象形态的因果关系,很容易认为只要能够把投资需求的关口把控住,就可以控制经济增长的节奏与幅度。而投资的起点是货币形态的资产,只要能够把财政与信贷关口把控住,就能够达到既控制投资规模又控制货币投入量的目的。事实上,对国民经济需求侧管理手段选择就是顺着这个思路进行的。政府选择了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并将其作为主要的宏观调控政策,其最初的动因也就在这里。

三、市场经济条件下宏观调控的政策选择与基本教训

中国政府从1990年代初开始有意识地运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进行间接调控,从而开始了所谓现代意义上的宏观调控。期间,尽管经济增长出现过较大幅度的波动,但总体上保持了高增长,以1991~2011年为例,GDP平均增长9.8%。在1990~1999年增长周期中,尽管前半部分高增长与高通胀并存,但后半部分却进入了高增长低通胀状态,被认为成功实现了软着陆;2000~2007年被认为进入了罕见的高增长低通胀状态。这样的发展成就,如果从GDP、CPI、PPI等角度说,无论如何应该以用“辉煌”这个词来形容。但是,这之后以产能过剩为核心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失衡,社会生产重大比例关系失调早已开始酝酿。据第三次工业普查资料显示,早在1995年,主要工业品产能闲置1/5~1/3的占27.2%,闲置一半的占18.9%,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产能利用不到一半的占19.1%,生产能力明显过剩,同时国内需求不足。1998年上半年,中国供不应求的商品为零,供过于求的商品达25.8%,供求平衡的商品占74.2%。^[1]2000年之后的经济高增长低通胀时期,产能过剩加速形成,直至酿成生产的全面过剩。本来,我们的煤炭需求约36亿吨(2016年),产能却达到了57亿吨;钢铁需求约为8亿吨,但产能多达12亿吨(2016年)……。^{[2][3]}总之,有几十种重要产品的产能利用率低于70%。这些过剩产能是经过国家宏观经济管理部门的审批形成的,也是在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影响下形成的。所以,今天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很能说明问题,一方面说明中国这些年来的宏观调控政策顾此失彼,它做到了GDP多年保持高增长与低通胀,但未能防止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关系的失调,最终酿成了严重的产能过剩、过度负债,主要依靠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宏观调控存在局限性;另一方面说明国民经济宏观经济管理部门的职能被严重削弱,这些部门没有按照社会化大生产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的要求对社会经济进行有效管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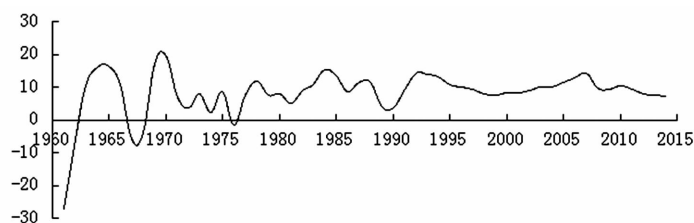


图1 1960~2015年中国GDP增长率(%)

数据来源: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运用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进行宏观调控的效果主要通过国内生产总值(GDP)、物价水平(CPI、PPI)、就业水平、国际收支等四大指标来衡量,正如这里的排序一样,在现实的宏观调控中,GDP、CPI、PPI是最为重要的指标。这些指标与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工具属于同一类型范畴,即价值范畴或经济参数,反映的是社会经济运行中的价值补偿与价格形态的变化趋势,不反映社会经济运行中的实物增长、结构变化与补偿问题。这样,在越来越倾向于使用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条件下,宏观调控紧紧盯着GDP、

CPI、PPI 等指标,整个社会似乎都默认,只要能保持经济高速增长、平稳增长、物价基本稳定,经济增长就处于理想状态。但是,在这种理想状态的背后,社会生产实物形态的结构与比例关系却早已开始走向失调,这既包括产品的供给与需求之间的结构失衡,也包括生产与消费、部类之间、部门之间、产品的生产之间的一系列比例关系的失调。

表1 1990~2016年中国经济发展状态与宏观经济政策

年份	经济增速%	宏观经济发展状态	宏观经济政策
1990	3.8	经济增长低谷。通货膨胀。	宽松的财政政策+宽松的货币政策
1991	9.2	经济增长迅速回升。通货膨胀。	宽松的财政政策+宽松的货币政策
1992	14.2	经济增长达到顶峰。通货膨胀。	宽松的财政政策+宽松的货币政策
1993	14	经济增长缓慢回落。通货膨胀。	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
1994	13.1	经济增长缓慢回落。通货膨胀。	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
1995	10.9	经济增长缓慢回落。通货膨胀。	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
1996	10	经济增长缓慢回落。通货膨胀。	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
1997	9.3	经济增长缓慢回落。低物价。	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
1998	7.8	经济增长继续回落。物价负增长,通货紧缩,需求不足,局部生产过剩。通货紧缩。	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
1999	7.6	经济止跌回升。通货紧缩,需求不足,局部生产过剩。通货紧缩。	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
2000	8.4	经济增长继续回升。通货紧缩。	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
2001	8.3	经济增长回落。通货紧缩。	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
2002	9.1	经济增长回升。通货紧缩。	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
2003	10	经济增长回升。低物价。	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
2004	10.1	经济增长回升。恶性通货膨胀。	稳健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
2005	11.3	经济增长回升。通货膨胀。	稳健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
2006	12.7	经济增长回升。低物价。	稳健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
2007	14.2	经济增长达到峰值。价格回升至通货膨胀。	稳健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
2008	9.6	经济增长回落。 由通货膨胀迅速回落至低物价。	稳健的财政政策+从紧的货币政策 积极的财政政策+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2009	9.2	经济增长回落。通货紧缩。	积极的财政政策+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2010	10.4	经济增长回升。低物价。	积极的财政政策+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2011	9.3	经济增长缓慢回落。接近通货膨胀。	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
2012	7.8	经济增长缓慢回落。低物价。	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
2013	7.7	经济增长缓慢回落。低物价。	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
2014	7.4	经济增长缓慢回落。低物价。	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
2015	6.9	经济增长缓慢回落。低物价。	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
2016	6.7	经济增长缓慢回落。低物价。	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

数据来源: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由于这种顾此失彼,尽管中国这些年来不断加强宏观调控,不断完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调控方式,但是既未能阻止严重的产能过剩的发生,也未能有效扭转经济的持续下行。面对困境,政府已经感觉到仅仅局限于所谓主流宏观经济政策(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范围内的宏观调控已经难以有效遏制中国经济继续下行的趋势,必须从经济发展的新常态出发转换宏观调控方式。把供给侧管理与需求侧管理相结合,目前正在推行的“三去一降一补”就是对以往过度偏重价值型调控方式的修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已经不是主要运用经济手段,而是行政与计划手段。调控方式已经不是以价值形态的调控为主,而是以使用价值形态的调控为主,价值形态的调控为辅。调控指标已经不是储蓄、投资、消费、物价、就业、财政收支(包括赤字)、国际收支、人民币汇率、货币供给、利率等价值型指标为主,而是以使用价值量指标为主。

财政政策有转移支付功能,它通过向资本和富人征税,用于公共事业、社会福利、社会保障、社会优抚等方面支出,可以增加社会购买力,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缓解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矛盾;货币政策对物价、投资、消费有一定的促进与抑制作用,但在经济的繁荣与萧条期,其作用较为有限。中国近20年来宏观调控的实践表明:当经济走向繁荣的时候,稳健的货币政策并未抑制信贷规模的过度扩张;危机时期宽松的货币政策虽然阻止了经济的下行,但是造成更大程度的产能过剩。2004年至2007年之间,“稳健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虽然维持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但未能减轻过剩产能的积累。2011年以来,“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既未能阻止经济下行的势头,也未能阻止新的过剩产能的形成与严重的资产泡沫化,尤其是房地产行业表现得最为突出,政府在无奈之下不得不动用严厉的行政手段,把“价值型调控”与“实物型调控”相结合,以实现宏观调控的目标。

四、对宏观经济调控方式的方法论反思

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中国管理层由于缺乏管理市场经济的经验,从西方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引进管理市场经济的理论与模式,并根据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逐步构建了一套有中国特色的宏观经济管理模式。期间,正是中国人口红利、改革红利、参与经济全球化红利、后发优势红利集中释放的时期,再加上宏观调控因素的综合作用,有效地实现了经济的多年“高增长—低通胀”。但是,这种发展势头没有被巩固下来,随着上述“红利”释放的减弱,以及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的爆发,“高增长—低通胀”发展势头趋于结束,产能过剩、债务高企、库存积压严重等开始集中释放,越来越重视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调控,片面重视价值形态指标的变化的弊端开始显现。

从理论上说,实现“高增长—低通胀”目标,需要把价值形态的增长与实物形态的结构调整有机地结合起来,而这需要综合运用宏观调控政策与调控手段协调两者之间的关系。但是,随着过度偏好于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时代的到来,宏观调控也就主要围绕着GDP、CPI、PPI、储蓄、投资、消费、物价、财政收支(包括赤字)、国际收支、人民币汇率、货币供给、利率等指标进行,实物形态的指标基本上形同虚设,没有多少约束力,以实物形态指标进行的宏观调控基本上被边缘化,虽然国家中长期发展规划、国民经济年度发展计划主要采用的是实物形态的指标,但实现这些规划、计划主要依靠价值形态的政策手段与调控工具来实现。这样,随着经济体制的转型,宏观调控的方式也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即计划经济时期主要以指令性计划与实物调控为主,市场经济时期则主要以指导性计划与价值调控为主,这种转型使宏观调控在避免了计划经济过度依靠实物形态调控转向过度依赖价值形态调控,从而使调控方式片面化,调控效果顾此失彼,调控结果导致严重产能过剩。

以凯恩斯有效需求不足论为基础的财政政策,其主要调控方向是投资需求与消费需求,目标是经济增长与充分就业,基本政策工具是政府收入与政府支出;以货币主义学派理论为依据的货币政策,其主要调控方向是保持一定的流动性,目标是实现物价稳定与经济增长,基本政策工具有存款准备金制度、再贴现政策和公开市场业务。财政政策把经济的繁荣与萧条周期性更替看作是有效需求不足或有效需求过度之间周期性波动的结果,只要政府通过扩大或收缩财政收支,能够逆经济周期增加或减少有效需求,就可以实现充分就业与经济增长。以新自由主义理论为基础的货币政策,更是把国民经济中的资源配置看作是一个完全受货币主导的过程,在该政策的使用者看来,只要能够控制广义货币量,就可以控制经济发展的节奏,就可以实现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物价稳定、收支平衡等宏观调控目标,而实施这项政策的基本工具是货币投放量、基准利率、再贴现率、公开市场业务。

在商品经济条件下,社会经济的运行本身是一个辩证的发展过程,它是社会生产各种比例关系的协

调过程,是使用价值运动与价值运动的统一,是价值形态均衡与实物形态结构对应关系的统一,也是价值补偿与实物补偿的统一。与此相适应,宏观调控也需以辩证的方法来加以应对。所以,我们在考察社会资本的运动时,既要考虑它的价值形态运动,还要考虑它的实物形态运动,既要注重价值量均衡与实物形态的结构对应。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在构建社会资本再生产的实现模型时指出,社会资本再生产的核心问题是社会总产品的实现,即价值补偿与实物更新的统一。他把社会总产品 W' 从价值形态和实物形态做了分解,从而提出了社会资本再生产的两个最为抽象的理论前提,即:从实物形态看社会总产品 W' 分为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与此相对应把社会生产部门分为第 I 部类和第 II 部类;从价值形态来看,社会总产品 W' 的价值分为转移的物化劳动的价值 c 与新创造的价值 $v+m$ 。这两个理论前提包含着产业结构的逻辑起点。

从上述理论前提出发,马克思构建了社会资本再生产最抽象、最简单实现图式,并从中得出了社会资本简单再生产与扩大再生产最简单、最抽象的实现条件,即:在最抽象层面上且仅仅考虑简单再生产条件下社会总产品的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平衡、两大部类之间的交换关系、第 I 部类内部的交换关系、第 II 部类内部的交换关系、固定资本的更新等因素,马克思提出了社会资本简单再生产的四个实现条件:(1) 两大部类之间的实现条件 $I(v+m) = IIc$; (2) 第 I 部类内部的实现条件 $Ic = I_c$; (3) 第 II 部类内部的实现条件 $II_{am2} = II_b(v+m_1)$ 或 $II_{bv} < II_{am}$; (4) $II_c(1)$ (更新的固定资本价值总额) = $II_c(2)$ (固定资本的年折旧总额)。此外,还有两个派生条件,即:(1) $I(c+v+m) = I_c + II_c$; (2) $II(c+v+m) = I(v+m) + II(v+m)$ 。^{[4]389-397} 由于从简单再生产到扩大再生产仅仅是一个“追加”问题,所以只须对简单再生产实现条件进行 c 与 v 的“追加”处理,即可得到扩大再生产最简单、最抽象的实现条件。故此处不再列举。^②

关于产业的内部结构,从联系与发展的角度看,它同样是一个辩证的结构。解析这个结构最适当的方法也应当是辩证法。马克思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为分解产业结构提供了标准范式。马克思从最简单、最抽象层面开始解析,他首先根据物质产品的最终用途把社会总产品划分为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与此相对应又把社会生产划分为第 I 部类和第 II 部类。在此基础上,他又进一步把生产资料划分为生产生产资料所需要的生产资料,以及为生产消费资料所需要的生产资料,与此相对应的生产部类也应当是 I_a (为第 I 部类生产生产资料的部类) 和 I_b (为第 II 部类生产生产资料的部类) 两个分部类,以及 II_a (生产生活必需品部类)、 II_b (生产奢侈品部类) 两个分部类。以此类推,按照辩证的一分为二的规则,还可以继续划分下去,直至具体的某一种产品。这样经过多个层次的划分之后,最终形成了一个从抽象到具体、从简单到复杂这样的社会总产品生产结构图式,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不同需要,求得各个层面生产与需求之间的均衡与比例关系,只是越处于具体层面,求得这种均衡与比例关系越是困难。但是,借助于现代计算机软件及数据处理技术可以轻而易举地完成这一任务,取得理想的计算结果。投入产出理论、方法及其在宏观管理中的运用,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事例。由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建立的两大部类(第 I 部类、第 II 部类) + II_a 、 II_b 模型,只是为了证明自己提出的假说:社会资本再生产要想顺利进行,社会生产中的部类之间、生产与消费之间、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必须保持比例关系,否则将导致经济危机。这样的论证,无须划分太多的层次即可达到充分论证的目的。也就是说,尽管马克思只是在社会总产品生产最抽象的层面上仅仅把社会生产部类划分两层,但已经可以推导出社会资本再生产的最基本实现条件,就已经达到了论证的目的。从马克思的结论中,我们很容易推导出这样的结论:国民经济要想顺利运行,社会生产的部类之间、部门之间、产品的供给与需求之间必须保持均衡与比例关系,不仅在价值形态上要保持均衡关系,使用价值形态上也要保持均衡(也就是产品的供给与需求保持结构上的对应关系),否则将通过经济危机强制地使已经失衡的经济重新恢复均衡,即形成新的均衡。一旦经

济发展到只能通过经济危机来调节社会经济的运行,这就意味着已经形成的生产力和财富的一部分必然被毁灭,债权债务关系必然被强制性解除,用目前流行的术语来表达,就是去产能、去杠杆、去库存。

马克思的社会资本再生产图式,从理论上为市场经济的宏观运行提供了标准范式。图式最显著的特征,也是它科学的地方,在于它全面地展示了社会资本再生产的基本实现条件,这些条件包括:社会总产品的供给与需求的均衡;生产资料的供给与需求的均衡;生活资料的供给与需求的均衡;生活必需品的供给与需求的均衡;奢侈品的供给与需求的均衡;货币的供给与需求的均衡;货币积累与实际积累的平衡;第一部类对生产资料的需求与供给的均衡;第二部类对生产资料的需求与供给的均衡;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均衡;……。这些均衡条件既体现着实物形态均衡与价值形态均衡的统一,也体现着价值补偿与实物更新的统一,社会生产只有满足了这些条件才能顺利进行。所以,宏观调控也应当是实物形态的调控与价值形态调控的统一,只注重其中的一个方面而忽视另一方面,都是顾此失彼,在满足了价值形态均衡的同时不能满足实物形态的均衡,或者在满足了实物形态均衡的同时不能满足价值形态的均衡,甚至造成更大的失衡,这样的宏观调控不仅难以实现经济的平稳增长,甚至会造成更大幅度的波动。社会主义国家以往实行计划经济的实践已经证明了忽视“价值形态均衡与实物形态均衡统一”规律的严重后果。1930年代大萧条之后,资本主义国家宏观调控的历史也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中国实行市场经济以来宏观调控的实践也从正反两方面证明了这一点。

中国目前正在推进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正是根据社会经济运行是一个辩证的过程而采取的应对措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供给和需求是市场经济内在关系的两个基本方面,是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关系,二者你离不开我、我离不开你,相互依存、互为条件。”^[5]正常的宏观调控模式应当是需求侧管理与供给侧管理的相互配合、协调运作。关于供给侧与需求侧管理如何协调运作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纵观世界经济发展史,经济政策是以供给侧为重点还是以需求侧为重点,要依据一国宏观经济形势做出抉择。放弃需求侧谈供给侧或放弃供给侧谈需求侧都是片面的,二者不是非此即彼、一去一存的替代关系,而是要相互配合、协调推进。”^[5]针对中国这些年来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认为,“中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供给和需求两侧都有,但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所以,必须把改善供给结构作为主攻方向,实现由低水平供需平衡向高水平供需平衡跃升。”^[5]以往应对经济周期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主要是需求侧管理方面的政策,这类政策“重在解决总量性问题,注重短期调控,主要是通过调节税收、财政支出、货币信贷等来刺激或抑制需求,进而推动经济增长。”而供给侧管理则属于中长期政策,“重在解决结构性问题,注重激发经济增长动力,主要通过优化要素配置和调整生产结构来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进而推动经济增长。”^[5]从中国当前正在推进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措施来看,主要运用行政、计划等手段,按照实物形态均衡的原则进行调控,财政与货币政策作为辅助措施予以配合,调控的任务与目标通过数量与实物形态指标下达。由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是解放、发展和保护社会生产力,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实现经济长期稳定增长。所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目标是提高使用价值的品质,改善使用价值的供给结构,实现使用价值的供给与需求的数量均衡与结构合理。从实质上说,今天正在进行的结构性改革就是对以往过度偏重需求侧管理、过度使用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纠正,是实践对以往宏观调控方法的修正,是针对产能过剩经济危机而采取的应对之策。

习近平总书记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论述,不仅对中国应对当前经济周期的宏观调控政策提供了方法论指导,也为中国未来的宏观调控提供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的政策手段与方法论。在习近平总书记供给侧结构改革理论指导下,中国当前正在进行的以供给侧结构改革为主、需求侧管理为

辅,供给侧与需求侧相结合的宏观调控模式,属于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社会再生产原理创造性地对中国经济进行宏观管理的典范。

五、中国驾驭经济周期需要马克思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的指导

从本质上说,寻求对国民经济进行有效的宏观管理与调控,就是试图驾驭经济周期。宏观调控是国家驾驭经济周期的基本形式。中国学者一开始研究中国的经济周期就将其研究目标定位于认识和驾驭经济周期。他们认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周期性波动也是必然的,其波动规律一旦被认识,就可以根据经济波动的态势,因势利导,“削峰填谷”,实现经济的高位平稳增长。但是,在运用什么手段驾驭社会主义经济周期问题上,他们基本上清一色地借鉴了“西方成熟市场经济体的宏观调控政策”,其中主体是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并且把西方主要经济体宏观调控体系作为参照系。其中的原因在于:他们对经济周期形成原因的认识与西方主流经济学家的认识是一致的,即都把经济周期的原因归结于有效需求不足、消费不足、储蓄过度、投资过度、创新周期、政治周期、心理因素等要素之一或几个要素的组合。从这些浅层原因、外部原因看待现实经济周期,所采用的宏观调控政策虽然能够在一定时间内、一定程度上达到刺激与抑制经济过度波动的目的,但作用有限。1970年代发生在西方的经济“滞胀”就是过度运用财政政策的结果;1980年代以来,金融危机愈演愈烈则与多年来过度依赖货币政策有关。

中国1993~1999年之间的经济成功软着陆,2000~2008年之间经济的“高增长”与“低通胀”,驾驭经济周期的这些初步成功,使中国学者、专家、官员对驾驭经济周期充满自信,但随着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的爆发,中国的宏观调控越来越捉襟见肘、顾此失彼、力不存心,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已经很难阻止经济的继续下行。对于中国近年来没有能够有效地避免严重的产能过剩、过度负债、经济下滑等问题,有学者认为,这是因为中国经济已进入新常态,出现了结构性减速,各项宏观指标如储蓄、投资、消费、物价、就业、财政收支(包括赤字)、国际收支、人民币汇率、货币供给、利率等出现了新的特点,宏观调控的基础、对象、目标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以往的宏观调控政策已不适应新形势下的宏观调控,必须寻求新的调控范式,建立宏观调控新常态。^[6]所谓宏观调控新常态,就是要充分发挥规划、财政、货币三大调控杠杆的合力,既关注短期波动稳增长,又兼顾长远促改革。这种由规划、财政、货币政策构成的“三位一体”的调控模式,强调以国家发展战略和规划为导向,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主要手段,并加强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产业、价格等政策协调配合。这种观点反映了一种迹象,即以往主要依赖价值形态调控的模式,其局限性已经逐渐显现出来,扬弃旧模式,构筑新模式,应当提上议事日程。当然,也有相反的声音。有学者认为,这些年来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控效果不仅没有缓解经济增速放缓的势头,反而进一步呈现出萧条的迹象,其原因主要在于政府对微观经济干预过多、宏观调控目标太宽、货币政策处于从属地位、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独立性不够。所以,作者主张构建以货币政策为核心的新政策框架,弱化财政政策的逆周期调节职能,大幅弱化产业政策的宏观调控职能。^[7]本来,作者的论证以美国的宏观调控政策、宏观调控实践为样本,但在得出这些结论、提出这些观点时,却回避了美国片面执行货币政策给世界经济造成的恶劣影响。

习近平总书记的“新常态理论”、“供给侧结构改革”,为中国应对2008年以来正在经历的经济周期提供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和基本思路。以往的宏观调控政策以需求侧管理为主,重在解决总量问题,注重短期调控,主要是通过调节税收、财政支出、货币信贷等来刺激或抑制需求,进而推动经济增长。而应对当前经济下行、产能过剩采取了以供给侧管理为主的宏观调控政策。往后,就经济的长期发展而言,宏观调控将协调使用需求侧管理与供给侧管理政策。经济繁荣时期以需求侧管理为主,供

给侧管理为辅;萧条时期以供给侧管理为主,需求侧管理为辅。两种政策相互配合、协调推进,将是未来宏观管理的常态。宏观调控模式的这种创新属于运用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原理创造性地解决中国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典范,因而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组成部分。

六、结 论

中国多年来的宏观管理尤其是经济体制改革以来的宏观调控,对促进 GDP 高速增长与物价基本稳定发挥了重要的影响作用,但它未能有效防范社会生产重大比例关系失调,最终酿成全面的产能过剩经济危机,使社会经济发展为此而付出了沉重代价。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主要在于宏观调控的方法失当,即主要运用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本质上是片面运用价值形态调控而忽视实物形态调控,从而违反了社会再生产是价值形态运动与实物形态运动的统一,是价值补偿与实物补偿的统一。这样一些基本规律,也有悖于宏观管理是供给侧管理与需求侧管理相互配合、协调推进的原则。马克思经济学关于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早已揭示了社会经济运行中的辩证关系,以及社会经济顺利运行的基本实现条件与满足这些条件的社会经济制度。马克思经济学的这些理论是我们管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驾驭经济周期的理论基础与方法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就是对马克思经济学关于宏观经济运行理论的创新与发展,因而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组成部分。中国今天正在推进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马克思主义宏观经济运行理论的指导。在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条件下,驾驭经济周期需要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

注 释

- ①因为“地方政府不需要控制宏观变量。通货膨胀、资产泡沫、全国就业水平,这些都由中央政府负责。地方政府的债务,最终偿债责任也在中央。所以,地方上是有钱就花,能借钱就借钱,能扩张就扩张。”^[8]
- ②还须进一步说明的是: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的条件,就是社会总产品各个组成部分如何实现的条件,也就是社会再生产的价值补偿和实物补偿的问题。社会总资本的运动“不仅是价值补偿,而且是物质补偿,因而既要受社会产品的价值组成部分相互之间的比例的制约,又要受它们的使用价值,它们的物质形式的制约”。^{[4]437-438}只有社会总产品的各个组成部分既在价值上得到补偿,又在实物上得到补偿,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才能继续进行。因此,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的核心问题,是社会总产品的实现问题,也就是社会总产品的价值补偿和物质补偿的问题。

参考文献

- [1] 邹东涛等. 中国经济发展和体制改革报告 No. 1: 中国改革开放 30 周年(1978 - 2008) [EB/OL]. 中国网, [2008 - 11 - 05] [2017 - 03 - 14]. http://www.china.com.cn/economic/txt/2008-11/05/content_16716661_3.htm.
- [2] 2016 煤炭行业发展总结 [EB/OL]. 经典网, [2016 - 11 - 14] [2017 - 03 - 14]. <https://www.ishuo.cn/doc/euhwdiqf.html>.
- [3] 2016 年我国钢铁行业现状分析: 钢铁产能严重过剩 [EB/OL]. 豆丁网, [2016 - 08 - 20] [2017 - 03 - 14].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6/0820/14/32638246_584555307.shtml.
- [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6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5] 习近平. 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 [N]. 北京: 人民日报, 2016 - 5 - 10.
- [6] 张晓晶. 试论中国宏观调控新常态 [J]. 北京: 经济学动态, 2015(4): 12 - 22.
- [7] 陈彦斌, 刘哲希. 中国宏观经济政策体系面临的困境与改革方向 [J].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16(5): 12 - 19.
- [8] 樊纲. 纵论中国经济十年之痒 [J]. 北京: 全球化, 2016(5): 94 - 98.

责任编辑: 刘威 魏旭

Discussion on the Definition Standard, Type and Nature of Excess Profits

Wang Haihong

Abstract: Unified understanding of different types of excess profits and the relationship among them has not been formed. This article firstly analyz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urplus value, profit and excess profit and points out two definition standards of excess profit. On the basis of sorting out the types and meaning of excess profits, the article analyzes the essential attributes of different types of excess profits and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among various excess profits. It finally gets the major conclusion as follows: there are different definition standards for surplus value, profit and excess profit; different understanding of excess profit is rooted in different definition standards, so the standards shall be unified into “sale based on commodity value”; excess surplus value and differential rent are both excess profits rather than surplus value and their essence is false social value; absolute rent is only surplus value rather than excess profit, and only the excess surplus value turned into absolute rent is excess surplus value in a real sense.

Reflection on the Issue of Public Ownership as the Main Body

Zhou Xincheng

Abstract: Reform must consolidate and develop the basic economic system, as well as pay attention to rather than dilute the problem of ownership. Ownership does not refer to the affiliation of objects. It is an economic category and the economic relationship between people. Under the present conditions, the connotation of public ownership is the socialist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Not all state ownership is public ownership, but only the state ownership in countries with 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 is public ownership. Shareholding system is a kind of capital organization form of enterprises, but it can not be regarded as public ownership. Public ownership as the main body firstly means the dominance in terms of quantity. Public assets should occupy dominance in social total assets and the quantity of employment in public economy should occupy dominance in the total quantity of employment in the entire economic sector. It secondly refers to control force in quality. The state-owned economy should control the lifelines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and the national economy should play a leading role. In terms of economic operation, the national economy controls and influences the operation of the entire national economy and it can ensure that the economic operation develops towards the intended goal. In terms of the relationship among various ownership economy, the national economy is capable of encouraging, supporting and guiding the non-public economy to develop in the direction in favor of socialism. Only by adhering to system of public ownership as the main body can we ensure the socialist nature of Chinese society. The public ownership of means of production adapts to the social nature of productive forces and is able to liberate and develop productive forces. Common development of more ownership economy requires greater emphasis on public ownership as the main body.

Practice of Western Mainstream Macro-control Policy in China and the Reflections

Liu Mingyuan

Abstract: The macro-control since the reform of China's market economy system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high GDP growth and basic stable price. However, it has not effectively prevented the imbalance of major proportional relations of social production, finally causing comprehensive excess production capacity, excess debt and severe backlog of inventory. The main reason is that China has put one-sided emphasis on the leading role of the fiscal policy and monetary policy in macro-control, but neglected the facts that social reproduction is the unification of the value form movement and the physical form movement and the unification of value compensation and physical renewal, and the corresponding macro management model should be a coordination system combining value form control and physical form control and matching supply-side management with demand-side management. Therefore, it is imperative for China's current and future improvement of macroeconomic operation quality to follow the guidance of Marx's theory of macroeconomic operation and improve the method of macro-contro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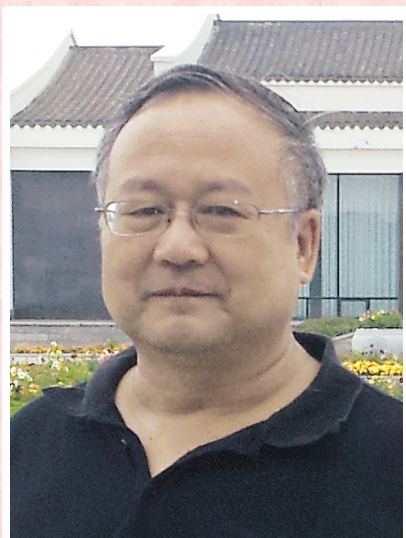
The Latest Development of Foreign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ics on the Study of Capitalism

Chen Jianhua

Abstract: At present, foreign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ists are increasingly inclined to the overall and integrated research methods. They stress that the concept of capitalism is not only a kind of production relationship and form, but a comprehensive social form including the political, economic, cultural and ideological forms. They have denied the view of considering American capitalism to be the standard capitalism in the world and affirmed that there are a variety of choices and forms of capitalism. Through the reveal and analysis of the internal 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ism, these scholars believe that capitalization, globalization and liberalism have caused the excessive development of financial capital and made the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class antagonism increasingly sharper, thus causing the structural crisis of capitalist society, which is typically manifested in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from 2008 to 2009. While questioning the vitality of capitalism, they have also put forward the possibility of revitalizing capitalism through adjustment and reconciliation.

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

刘明远



刘明远(1961—),经济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生态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和周期理论的研究。主要学术著作:《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和周期理论的结构与变迁》、《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与当代现实》、《走进周期性金融危机的深处》。主持、参与多项中国社会科学基金和省部级研究课题。

在各类学术期刊发表论文60多篇。《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和周期理论的结构与变迁》获得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著作外译项目”资助,即将在国外翻译出版。

主要学术贡献:(1)在深入、系统研究马克思经济学“六册结构”计划以及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演变的基础上,根据马克思的众多提示与论述、经济危机的历史与理论的发展,深入地研究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和周期理论的结构与变迁,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演变规律提出了一系列独到的见解,尤其对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体系、结构、内容从“六册结构”体系的角度作了解读论证。(2)跟踪研究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以及中国经济周期的演变,对现代世界经济危机的发生、根本原因与具体原因、传导机制与扩散过程、阶段性特征、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反危机的政策与效果等进行了系统研究,提出现代条件下周期性经济危机已经发生转型。(3)多年研究马克思经济学著作“六册结构”计划,不仅总结概括了“六册结构”计划的具体内容与结构,还从这个计划的视角对发展和完善马克思经济学体系作了多方面解读,在此基础上重点研究了现代生产方式对马克思“六册结构”计划的影响,从理论、历史、现实、方法等多视角寻求构筑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途径,为继承和发展马克思经济学理论体系提供依据。(4)以马克思、恩格斯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为指导,运用《资本论》方法系统研究了生态科学以及中国北方地区生态环境演变的历史,尤其对毛乌素沙地及鄂尔多斯地区近代以来生态环境加速恶化的原因做出了生态经济学意义上的解释。在多年跟踪研究鄂尔多斯生态建设及生态环境演变的基础上,以此为典型性研究与分析的样本,对“鄂尔多斯生态建设模式”进行了系统总结概括,其政策建议已被地方政府采纳,并最终演化成一项国家生态建设政策,且效果显著。(5)全面、系统地研究了国内外生态经济学,提出了建立马克思主义生态政治经济学的设想,并且作了系统论证。(6)运用马克思地租理论、资本循环理论、信用理论、虚拟资本等理论,论述了中国矿产开采与生态环境保护中的利益分配、民间借贷稳定运行与发生危机的实现机制等问题,提出了具有可操作性的政策建议。